



张居正吏治中的儒学（张学智）

(2006-11-2 14:12:13)

作者：张学智

北京大学教授 张学智

张居正以大胆革新的内阁首辅知名,世多知其综核名实,以智术御下的方面。但他生在理学极其发达的明代,又以科举入仕;升任翰林院编修后,曾兼管国子监司业事。又为隆庆皇帝登基之前及幼小的神宗的经筵讲官,主持过隆庆五年的会试,又曾主编过《谟训类编》等经筵日讲讲章,编写过《女诫直解》之类的后妃通俗读本,儒学的浸润不可谓不深,修养不可谓不高。所以在王霸并用的治术后面,有许多作为儒家学者的表现。

一、张居正的治国原则

首先,在他认定的治国原则上。他的治国原则,一以儒家经典《尚书·洪范》为依据。他说:“若言建皇极,敬五事,兼三德,用八政,则诚万世治天下之大经大法也。”皇极即最高准则,其内容后世儒者各有阐说,当不外儒家所谓天、德、道、理等代表价值原则、精神趋向之范畴。五事即貌、言、视、听、思等个人行为规范,三德即刚克、正直、柔克等精神气质方面,八政是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即关于农商、祭祀、营造、文教、司法、外交、军事等国家事务方面。这些内容,既有民族的精神价值,又有军国重事,又有个人的气质修养。可以说是一个简括的政纲。张居正以此为治国的大经大法,可见他是以儒家思想为治国理念的。

张居正虽以商之整肃、强盛作为致治理想,但他也重视礼制的作用,对儒家圣王制礼作乐的功绩十分景仰,对历史上曾协助帝王制礼作乐的儒臣,特别是明初的儒臣持肯定态度,对礼乐修明对于政治的重要性再三强调。他曾主持《大明集礼》的修订,在为此书作的序文中说:“王者治定制礼,因时立制,累数十年,然后乃备。周至成王,周公始制礼作乐。……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承胡元极衰之敝,经制大坏,先王之典无有存者。当是时,又攘除群雄,殄逆讨叛,迄无宁岁。而将相大臣,皆武力有功之人,至于稽古礼文之士,莫有任其责者。高皇帝天纵神圣,兼总条贯。天下甫定,即命儒臣兴制度,考文章,以立一代之典。夏商以后,议礼之详者莫如成周。而我皇祖之制,实与之准焉。……明兴百八十余年,高皇帝作之于前,今天子述之以后,奕世载徒德,重熙累绩,稽古礼文之事,衰然具备矣。则所以一民之行而易民之俗者,又奚必远有所慕哉!”此序不可看作对朱元璋和嘉靖皇帝的谏词,而是张居正的心声。因为张居正的其他奏疏、序记、书牍等有大量同类材料。此类材料也不可看作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万机之务中必须有的例行酬答,而应视为他作为儒家学者的根本主张。因为在儒家眼中,礼制作为一个国家的大经大法,是维持国家存在和运转的支柱,是一刻也不能无的。并且礼制也不与刚猛对立;礼制肃然,是刚猛的一个表现。

张居正在政务之余,常阅读儒家经典,并随手札记。此类札记虽不多,但其中有字句的辨误,意思的理解,也有对古今史实的即兴评论。这说明他并非厌弃儒书,鄙视儒生。如一则札记中说:“陆象山言,唐虞之时,道在皋陶。今观虞廷之臣,所谓陈谏献说,唯皋陶之言为最精粹。知人、安民二语,乃万世治天下之准则。以九德甄别人才,以率作考成,保泰守业,无一语不关切治道。……后世唯伊尹学术事业可与并称,至于周公稍觉多事矣。”最后一句《四库总目提要》举为张居正诋毁圣人的证据之一,并作为《张太岳集》的疵点之一进行批评。这一点这里搁过不说。要注意的是,本条札记不仅引用陆象山的观点,而且论说的是儒家经典《尚书》之事。这除了表明张居正以辅主致治的皋陶自我期许,所以对唐虞与皋陶的关系特别加以关注之外,他平日多读儒书,多注意儒者的评史之言,恐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点。至于札记中发挥《大学》止至善之义,赞扬《中庸》五德,则更是儒者之言了。

其次,张居正非常重视教育,视之为培养德义,转化风习的地方。尤重视各级地方学校。在嘉靖二十九年初往翰林院编修时,即应宜都县学教谕之请,为新修葺的县学撰写记文,其中可以看出张居正对学校功能的认识及其中寄寓的扁

勉之意，记中说：“古之王者，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皆所以整齐人道，敦礼义而风元元者也。夫教化不行，礼义不立，至于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将无所措手足。当此之时，虽有严令繁刑，只益乱耳。乌能救斯败乎？由此观之，导民之术在彼不在此也。……自孔子没，微言中绝。学者溺于见闻，支离糟粕，人持异见，各申其说于天下。于是修身正心，真切笃实之学废，而训诂词章之习兴。有宋诸儒，方诋其弊，然议论乃日以滋甚。虽号大儒宿学，至于白首犹不殫其业。而独行之士，往往反为世所姗笑。呜呼！学不本诸心，而假借外以自益，只见其愈劳愈敝矣。”文中此即礼，彼即法，张居正是对比孔子“导之以礼”和“导之以法”两种不同求治方向立论的。可见他并非徒倚法而不重教化。张居正倡导本诸心的儒学，即认真研究，体之于心，而后有得之学，汉儒的训诂词章和宋儒的无根议论，都在排斥之列。对于明代诸朝风俗之美窳，张居正向往民风醇厚、民气质朴的成化、弘治时期，对嘉靖中期以后由于宗藩侵占庄田，豪家大肆兼并土地造成的贫富不均加剧，流民增多所带来的社会风气的变化不胜忧虑。他在一篇写于嘉靖后期的记中曾说：“余闻里中父老，往往言成化、弘治间，其吏治民俗，流风蔑如也。是时明有天下几百年。道化汪濊，风气纯古，上下俱欲休息乎无为。其继也，醇俗渐漓，网亦少密矣。一变而为宗藩繁盛，鞅权挠正，法贷于隐蔽，再变而为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又变而为侨户杂居，狡伪权诡，俗坏于偷靡。故其时治之为难。非夫沉毅明断，一切以摘奸剔弊，故无由胜其任而愉快矣。”成弘间之风俗醇厚，盖亦有然。朱元璋揽军国大权于一身，不设宰相，诏以为恒制。以刚猛治国，号以为矫元代之弛缓。但过于残刻，洪武初年连兴大狱，官民怖慄。建文起而纠之，上下稍甦。但不一二年而成祖兴“靖难”之师。成祖沿袭乃父，治术尚猛。又废黜建文之法以示己之正统与维护祖制，明令：凡皇考法制更改者，悉复其旧；祖宗之法所以为后世，当敬守之，不可以变。又好大喜功，连年用兵北疆，且因迁都北京，营建宫舍，国力不支。于是外示宽仁而内用严苛。仁、宣两朝惩永乐之失，转变国策，不再用兵北方，休兵养民。提高内阁的权力和地位，洪武、永乐间高度集权、帝王个人独断的局面有所舒缓。并且多次下“宽恤”令，施行赈灾和蠲免租税。对成祖时得罪的官员，也下令宽宥和平反。官吏治理风格和民间风俗习尚为之一变，宣宗致被称为“太平天子”。但仁宣两朝以宽仁治国，虽有甚好的效果，但亦导致法令渐弛，屯田多为内监、军官占有，兵士逃亡严重，战斗力削弱。英宗朝国家多故，土木之役，对明朝的惩创尤为严重。可以说是明朝由盛渐衰的一个转折点。宪宗崇佛道，好方术，信用太监，专宠万贵妃，阁臣、六部多不得人，当时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民谣，内忧外患屡起。孝宗继位后，对成化朝的弊政有所纠正，主要措施及所收效果如史官所言：“孝宗恭俭仁明，勤求治理，置亮弼之辅，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士，绝嬖倖之门，却珍奇、放鹰犬、抑外戚、裁中官，平台暖阁，经筵午朝，无不访问疾苦，旁求治安。”史称“弘治中兴”。此时国力强盛，百姓晏安。治国风格宽猛适中，人民安居乐业，风俗较历朝为好。《明史》甚至综合、比较有明一代帝王之治绩，说明代十六帝中，开国之洪武、永乐而外，可称者为仁、宣、孝宗三朝，而孝宗尤所称道。正德后诸帝，可称述者不多，明季之坏滥更甚。张居正提起风俗一事，一是说明他非常重视朝政之好坏对民间风俗的影响，将正德、嘉靖以来风俗之坏归咎于政治之坏，为他的改革设想中教化方面的措施树立根据。这仍是儒家学者以政治之美带动风俗之厚，以风俗之厚促进政治之美的传统路数。二是，他综合当时形势的各个方面，对嘉靖之后的风俗与与之相连的政治前景充满忧虑。在此《记》的末尾他说：“嗟乎！明兴才百九十年，而变已如是。吾安知继今以往，其将变而厌弃今俗，以复古之敦庞简易乎？抑将变而愈甚，以至于莫知其所终乎？后之治者，非随俗救弊，又将安所施乎？是皆不可知也。”今后之政治之美恶不可逆料，所知者亦在不能因常袭古，据民之所愿，时之所宜，对以往不合时宜之处进行振刷兴革而已。

二、张居正与民间讲学

张居正之为儒家，还表现在他对学校的重视上。他在学校教育方面的理念和改革思路，集中体现在他万历三年所上的《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中。在这篇重要的奏疏中，他提出了整饬学校的根本主张，这首先在于全社会重新认识学臣、学校的重要性。他指出，强国之本在人才，作养人才在学校，学校办的好坏在学臣。明代建国之初极重学臣之选，充任此职者，不独学行皆优，且能正己肃下，敢于建言者。故多海内名流，多能以道自重。士习儒风，端然有古人意。但演至后代，人多争趋阁臣部员，渐渐视学官稍轻，学官也渐不能自重，故多弊行，不能服士子之心。提学等官，亦多不管政情士风。职掌既无关大政，人亦不以重任视之。甚至以学校为养老之地：“士之衰老贫困者，始告授教职。精力既倦于鼓舞，学行又歉于模范。优游苟禄，潦倒穷途。是朝廷以造士育才之官，为养老济贫之地，冗蠢甚矣！”他提出整顿学校的十八条措施，皆针对学官、生员之弊事而发，如除地方儒学外，不许别建书院。提学官不许借故生事，干请荐举。生员职在读书明理，除此之外，不许陈说民情，议论官员贤否。重新申明讲说书义，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以典实纯正为尚。并明令务将颁降之《四书五经性理大全》、《通鉴纲目》及当代诰律典制等书诵习讲解，适于世用。有袭用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其他关于生员廩额、考校、奖惩、荐举等细目尚多。其中尤当注意者在第一条，因为此条与张居正关于民间讲学的态度有关。此条申明：“圣贤以经术垂

[\[关闭窗口\]](#)